

# 关于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科发展的思考

马仁杰 许 茹

**【摘要】**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是学科遵循时代更替和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学科拓展学术空间与提升外部影响力的现实需求。文章探究了学科更名带来的新机遇,包括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提高档案学学科影响力、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重塑档案数字人才培养机制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一级学科更名后推动档案学科发展必须协调好的几对关系,即坚守学科独立和实现学科边界泛化两种趋势的关系,承袭历史学传统和实现信息学转向两条主线的关系,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两门学科的关系,档案学实践探索 and 理论构建两重维度的关系等。

**【关键词】**一级学科更名;档案学;学科定位

**【作者简介】**马仁杰,安徽大学管理学院;许茹,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档案与建设》(南京),2023.5.12~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色档案学的价值阐释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TQ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2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明确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内容包括:回顾“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的历史进程与重要意义<sup>[1]</sup>,探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的建设策略<sup>[2-3]</sup>,论述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sup>[4]</sup>、图书馆学<sup>[5]</sup>、情报学<sup>[6]</sup>的学科发展路径,以及一级学科更名对图书馆事业、档案专业教育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sup>[7-8]</sup>。相关学术成果肯定了一级学科更名的必然性,笔者亦持相同观点。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能够及时进行学科改革与创新,为档案事业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中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体系建构指明了前进方向。

## 1 一级学科更名为档案学科发展带来新机遇

### 1.1 有利于档案学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

为应对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的冲击,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等一系列重要部署。202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再次要求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

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档案天然具有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数据价值使得档案工作成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有效实施、数字社会治理能力稳步提升、数字中国建设全面推进等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因此,一级学科更名是档案学适应数字社会、信息技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等现实情境的必然结果。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能够更好地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增强迎合数字社会发展需求的响应速度,及时获取数字中国建设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学科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做出调整,并建构根植于数字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助力各级各类档案机构成为推动数字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全面应用于档案工作全过程,档案信息资源海量增长,载体形态不断更迭,资源类型更加丰富,档案用户的信息需求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传统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已无法适应复杂的档案工作情境。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与情报学、图书馆学等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关联度更高,能够在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服务数字社会转型为导向,实现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变革,有效指导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实践,为实现数字生态发展格局总体保持稳定贡献力量。

## 1.2 有利于提高档案学学科认可度

其一,学科影响力有所增强。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可清晰揭示出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内在联系和共有基础,即档案、情报和图书的本质都是一种“信息资源”。因此,档案界能够对档案学的学科方向达成共识,对以档案信息资源收集、整理、组织、开发和利用等为中心的档案信息运动的本质及其规律展开纵深研究,加快产生一批处于理论研究前沿的原创成果,提高档案学在信息资源管理实践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档案学学科地位随之提高,能够吸引更多具有信息学科、数据科学或计算机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教育者和从业者关注档案学研究领域,并通过引入、吸收、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技术来促进档案学科自身改革与创新,增强档案学的“技术主义倾向”。

其二,档案学社会关注度有所提升。长期以来,档案的“内向性”及档案工作的“神秘性”导致档案学社会关注度低,“小众”“冷门”成为社会公众对档案学的刻板印象。一级学科更名后,作为二级学科的档案学自然具有了更宏大的学科使命和社会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档案业务流程研究,而是着眼于国家重大战略和高质量发展需求,迅速找准学科发展方向,将站位更高,其核心理论可应用于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继而提升档案学社会贡献力。

## 1.3 有利于档案学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档案对外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贡献力。”<sup>[9]</sup>在国际档案界建构并确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的学术话语权,是我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王宁、李孟秋通过调查国外55所高校档案专业教育平台后发现,其中38所院校将档案学归属于信息学或信息技术学院。<sup>[10]</sup>这说明国际档案界普遍认可将信息科学作为档案学的上位学科。因此,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的基本概念、专业术语、研究范畴、话语表述等能够更容易被国际档案学界理解与接受,推动我国档案学研究在国际交流中主动占据学术创新制高点,对国际档案事业的

普遍性问题给出中国方案,总结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增强我国档案学在国际档案界的影响力。<sup>[11]</sup>

## 1.4 有利于重塑档案数字人才培养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于档案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提升,档案数字化人才需求快速增长。为此,重塑档案数字人才培养机制,从根本上化解档案数字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成为档案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级学科更名从政策层面为重塑档案数字人才培养方案指明了新方向。

首先,复合型数字人才将成为档案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目标。各高校档案学专业正加快构建与数字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将数字素养教育贯穿于档案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使学生能够在精通档案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基础上,成为具有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处理,掌握数据存储和数据安全技术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其次,推动档案学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当前,随着档案人员的角色定位由被动的档案保管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服务者,档案学专业需要根据数字社会发展趋势和档案事业实际需求,在保持档案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提高数字技术应用教学内容的比重。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强化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对档案数字人才培养的引领作用,解决档案学人才培养模式与档案职业需求的错位问题,提高档案学服务社会需求水平。

最后,优化档案学师资队伍。现阶段,大多数档案学教师仅具备档案学科背景,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师资队伍需要将更多具有数字人文、计算机科学、大数据分析、数字媒体、互联网等信息类学科背景的教师纳入招聘范围,提高师资团队的数字素养。同时,要通过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方式鼓励在职教师增强跨学科思维,拓展学科视野,主动学习信息资源管理类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和应用技能。

## 2 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发展应协调好的几对关系

### 2.1 坚守学科独立和实现学科边界泛化两种趋势的关系

档案学的学科独立是指档案学区别于情报学、

图书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质性差异,这种本质差异是档案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195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颁发的《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将档案学列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sup>[12]</sup>,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正式承认了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属性与地位。自此,档案学的院系设置日益完善、档案学术共同体逐渐扩大、独立的档案学术机构和档案学专业期刊纷纷涌现……但是,档案学的学术积淀有待提高,学术基础有待巩固、学科自信有待强化。因此,坚守档案学的学科独立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提高档案人的学科自信和学科自觉,维系档案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

档案学的学科边界泛化是指档案学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队伍的学科背景等与其他学科逐渐融合、交叉,学科界限日益模糊。档案工作实践具有的综合性、政治性、社会性使得档案学具有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烙印,再加上数字人文、新文科建设等学科改革方针的大力推行,档案学学科边界泛化成为必然趋势。

一级学科更名后,需要协调好坚守学科独立和实现学科边界泛化两种趋势的关系。一方面,坚守学科独立不能自我封闭,自我陶醉,忽视其他学科的理论优势和学术成果,否则将导致档案学的学科内涵不断缩小,乃至造成学科萎缩;另一方面,实现档案学边界泛化并不等于否定档案学的学科独立性,而是应该在坚持档案学独立的前提下以批判的精神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知识体系,避免档案学在一级学科更名后陷入被边缘化、被矮化的陷阱。

## 2.2 承袭历史学传统和实现信息学转向两条主线的关系

档案具有的原始记录性使得原始档案文献成为历史学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材料,这也是档案学最初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出现的原因。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全面加快以及电子文件单轨制的推行,档案管理工作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档案学逐渐融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sup>[13]</sup>在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和一级学科正式更名的双重驱动下,档案学的发展主线由历史学传承向信息学加快转向,“历史化”研究取向的

日渐式微和“技术化”研究取向的日益兴盛容易造成档案学理论体系根基日渐薄弱。<sup>[14]</sup>档案学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协调好承袭历史学传统和实现信息学转向两条主线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协调档案学研究中的“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研究取向的关系。

档案学人既要有历史学的知识背景又要有信息学科的研究思维。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人要善于应用历史学固有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理论工具等,将历史学的学术理念嵌入档案学研究活动中,增强档案学的理论底蕴和学术积淀。同时,档案学人也要懂得利用信息学科的研究工具推动档案学逐渐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第四研究范式阶段过渡。

## 2.3 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三门学科的关系

一级学科更名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都不再出现在一级学科名称中,这必然会引发对二级学科地位弱化的担忧。因此,档案学必须协调好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从而实现三方高质量协同发展。

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三大学科必须求同存异。求同是指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必须凝聚合作共赢的学术意识,共同分享最新的理论成果,为实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学科使命贡献力量。存异是指客观看待档案学、情报学、图书馆学在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理论工具、叙事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在分歧中寻求三门二级学科发展的汇合点。以研究对象为例,我们必须承认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差异的,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信息组织的信息开发,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利用的信息保存<sup>[15]</sup>,但是,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从系统工程的技术角度来看,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sup>[16]</sup>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本质上是对某类社会信息及其运动过程的理论抽象。

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必须保持良好的耦合关系。“耦合”侧重指在同一系统内的不同单元(元素)之间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关系格式。<sup>[17]</sup>本文的“耦合关系”是指,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框架下,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协同并进、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即实现图情档一体化。笔者早在2005年就提出了“图情

档一体化”的构想,认为:“图书、情报、档案都是知识的载体,同属于文献型信息资源,具有同源性,档案学应与图书、情报学朝一体化方向发展。”<sup>[18]</sup>在图情档一体化模式下,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不再各自开展学术活动,而是以一级学科为主题搭建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平台,鼓励各方学术力量参与其中,逐步建立学科内部交流渠道和机制,提高图情档学者群的学术交流深度,在叙事逻辑、话语体系、研究范式、方法工具、学科知识等方面增强一级学科内部耦合互动,从更广泛的学科视野和更客观的学科立场来考察档案学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从而在学科交叉中不断革新。

#### 2.4 档案学实践探索和理论构建两重维度的关系

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变得更加复杂,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成为实现档案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首先,档案学实践探索和理论构建必须实现双向互动。一方面,档案学理论建构要引领实践探索,这就需要加快推动档案学理论成果在档案场景中的应用。比如,一级学科更名使得“信息”或者“数据”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围绕档案数据治理、智慧档案馆、档案数字孪生等热点开展的研究成果能够有效提高档案学服务数字社会转型的能力。另一方面,档案学实践探索要反作用于理论构建。档案学者需要有极强的学术敏感度,及时发现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对档案实践工作中形成的丰富经验进行理论层面的总结、分析、提炼与归纳,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中获得客观规律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认识。<sup>[19]</sup>

其次,档案学理论建构要允许具有“超前性”。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档案学研究往往强调对档案现象的合理解释和对档案事业的科学指导,但是对档案工作发展的超前思考却往往被诟病为“脱离现实”,以致档案学在研究内容分布、学术资源配置、研究热点迁移等方面都缺少了几分“理论色彩”。为此,档案学理论建构需要强调“超前性”,以利于档案学科催生出新的增长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前”的理论也必须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或者某一场景中得到检验或者应用,否则只能昙花一现,犹如无根

之萍泯然于茫茫学海之中。

#### 参考文献:

- [1] 冯惠玲. 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 12(6): 4-10.
- [2] 初景利, 黄水清.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14): 3-9.
- [3] 马费成. 凝聚共识, 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3(1): 4-8.
- [4] 路思, 杨静. 守界、跨界与扩界: 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的档案学未来发展[J]. 档案与建设, 2022(12): 13-17.
- [5] 龚蛟腾, 王璐, 易凌. 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图书馆学发展的机缘、困境与出路[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2(6): 3-12.
- [6] 王忠军, 于伟. 应对时代挑战, 拓展发展空间: 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情报学发展[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3): 1-5.
- [7] 常大伟, 黄轩宇, 段莹茹. 一级学科更名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生教育的内涵拓展及实现路径[J]. 档案与建设, 2022(12): 18-21.
- [8] 冯耕.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及展望——基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2(11): 119-122.
- [9] 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 [2023-05-26]. <https://www.saac.gov.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5c890762868683.shtml>.
- [10][14] 王宁, 李孟秋. 国外档案学科学学位设置与科研发展领域分析——基于对国外55所院校的调查[J]. 档案学通讯, 2022(3): 104-112.
- [11] 张斌, 杨文.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 档案学通讯, 2019(5): 4-12.
- [12] 邢变变. 中国档案学共同体研究[M]. 上海: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9.
- [13] 马仁杰, 李珍. 论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演变[J]. 档案学通讯, 2007(2): 19-21.
- [15] 金胜勇, 李雪叶, 王剑宏.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6): 11-16.
- [16] 钱学森. 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及其影响[J]. 档案学通讯, 1979(5): 6-10.
- [17] 田力男. 新文科背景下公安院校法学学科建设与展望——以法学与公安学科建设的耦合模式为例[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2(4): 42-51.
- [18] 马仁杰, 孙明慧. 新形势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以及两个一体化[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05(6): 68-70.
- [19] 许茹. “互联网+”时代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D]. 合肥: 安徽大学, 2021.